

红色文化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探析

吕红红

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庆阳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们党重要的根基，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标识，是中国特有历史实践沉淀下的思想财富，它穿越时空的价值和影响，已融入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中。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是中华文化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现状，分析当前红色文化翻译传播中存在专业术语表述不规范、译文表达不准确、海外传播接受度低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要加强红色经典文化术语标准化步伐，设置相应红色文化翻译管理机构，培养和储备专门翻译人才，搭建线下线上文化传播和体验平台，旨在促进红色文化外宣传播。

【关键词】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策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陇东学院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翻译传播学视阈下陇东红色文化外译策略研究”（XYSK21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84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ed classic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Honghong Lv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Red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d culture text translation and find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non-standard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translation terms, inaccurate translation, and poor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Given the above problems, the publicity activities of red cul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four aspects: 1.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d culture terms. 2. Set up a special red culture transl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 or organization to trai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3. Build an offline and onlin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platform. 4.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vite and organize foreign media or professionals to visit the revolutionary shrine.

【Keywords】 Red classic; Exter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strategy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红色文化是中

国革命精神的标识，是中国特有历史实践沉淀下的思想财富，它穿越时空的价值和影响，已融入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弘扬革命精神，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播，有益于应对时代挑战，构建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

中国红色经典翻译传播最早可溯源到由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所译的《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2]。延安时期红色经典的外宣翻译传

作者简介：吕红红，女，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英语教育研究。

播,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成为该时期西方了解中国红色文化的窗口。20世纪20年代,国外记者开始不断译介毛泽东著作,开启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192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5期)用俄文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英文版后续也刊载这篇论文。1946年,美国记者斯蒂尔曾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发表了《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几次访问毛泽东,她将访问纪录发表在1947年10月10日的苏联《文学报》上。通过这些红色著作的出版和国际友人积极宣传,西方国家才得以聆听来自红色中国的真实声音,才得以有后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和后来西方舆论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客观支持。由此可见,外宣翻译作为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的媒介,成为国外受众了解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渠道。研究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有助于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红色文化认知,加强中国红色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播。

2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以“红色文化”作为关键词和主题进行检索,近十几年来国内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发文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以“红色文化”作为主题检索出36248篇相关论文。以“红色文化”作为关键词来检索出15842篇相关论文。红色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个课题。《红色文化学刊》《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作为国内有关红色文化研究和发表的重要期刊,对红色文化宣传和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笔者采用对比,整合的方式,梳理了这些外宣翻译文献,大致将这些研究归类如下。

2.1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

根据上述的检索结果,笔者对其进行分类,发现部分研究者回归文本研究,着重分析文本翻译存在的问题,侧重对红色文化经典译本和旅游译文研究,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王克非、王颖冲(2016)探讨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将中国特色文化词汇分为“完全空缺”和“不完全空缺”两类,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翻译策略^[1]。倪秀华、焦琳(2023)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

动,爬梳小语种译本的出版情况,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4]。无论是文化经典译本还是红色旅游译文,词汇翻译研究都成为关注重点。意义作为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实现跨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也是翻译工作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在红色文化文本翻译中,回归到语言层面,对词汇翻译进行深入探讨也是一个非常必要和合适的切入点。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国内红色文化经典的译介,主要包括红色经典译著及其战时红色期刊的对外翻译。红色经典译著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人民实践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探讨红色经典著作对外翻译,利于将革命时期各种优秀品质和精神分享给全世界。倪秀华、李启辉(2021)梳理1949-1966年间的红色经典作品翻译、发行和传播路径,以及多样化的翻译效果,以期展示红色经典强大的域外生命力^[5]。周晔(2016)分析红色经典中有关“抗日”的英文表达与传播,通过重温几部红色经典中有关“抗日”的英文表述,实地考察延安革命纪念馆,调查了西方读者对“抗日”一词英译的反应^[6]。尚亚宁(2022)探讨期刊《中国呼声》在反帝反法西斯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报道、译介和传播,《中国呼声》的中英双语译介范式和中外合作办刊模式对当前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7]。石欣玉、黄立波(2021)采用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路径,以同源文本这一概念为基础,以毛泽东著作译入和译出文本为考察对象,使用语料库方法比较不同译本在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探讨两种翻译方向中译本对国家形象的建构^[8]。红色经典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将红色革命成果积极主动推向世界,与世界分享革命精神和各种优秀品质。

第二类聚焦在红色旅游译文的词汇研究上。这类研究基于实证研究,通过对比,试图分析源语与目标语间文本等值差异、翻译策略运用,描述红色旅游文本的词汇特征,揭示源语和目标语文本词汇翻译时的本质和内在属性。涂熙玲分析“红”字在中西文化中的意义差别,从文化层面讨论红色旅游文本的特色词汇翻译,带“红”字与不带“红”字两类文本翻译策略^[9]。周晔(2016)通过考察“抗日”一词的多种译文以及外国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发现读

者对于同一译文的理解出现较大差异,研究者因此提出核心词汇需要根据语境调整翻译的观点^[10]。考察中外红色旅游文本间的差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为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和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邓晓宇(2015)自建语料库,对比中国红色旅游文本和欧美革命战争旅游文本间的词汇差异和特点^[11]。尽管大量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在红色文化的翻译文本本体研究上,然而现有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方面整体仍显不足,呈现出红色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相关研究总量严重匮乏,理论深度欠缺、论证不严密等问题。因此,要提高红色文化翻译的外宣传播,除了坚守文本本位意识外,还需加强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结合、有益于红色文化对外传播。

2.2 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理论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仅聚焦文本本位意识不足以解决对外文化传播。鉴于此,学界开始挖掘翻译中语言层面背后的各种机制,将红色文化文本翻译视野从语言间的形式对比转向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文本功能、译者地位、外宣翻译传播战略等层面成为红色文化文本翻译研究中聚焦的另外研究课题。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并应用到红色文本的翻译研究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功能主义、目的论,生态翻译学、跨文化交际和翻译传播学等诸多理论被应用到红色文化翻译研究中,拓宽了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做好外宣翻译。

2.2.1 翻译目的论视角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超出语言符号的使用,是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翻译目的论成为翻译研究新的视角,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最核心部分。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12]。译者必须根据具体翻译目标,制定相应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行为要实现三个基本目的: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13]。“由于功能主义目的论强调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决定作用,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该派理论更适用于“目的性”较强的非文学类文本翻译”^[14],外宣翻译作为非文学类文本翻译,外宣成为其目的。赵艳、苏贝娇(2018)从红色文化旅游外宣翻译的目的论视角,分析三明市红色文化旅游

外宣翻译特点与问题,探究其外宣翻译策略^[15]。肖群(2009)指出红色旅游汉语文本注重呼唤功能,外宣文本侧重信息功能^[16]。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自身有其目的。无论是有意图还是无意图的目的,都会在跨文化语境下产生结果,为保证在译入语文本中产生同样效果,尤其是像红色经典这种文本,涉及有一些特色文化词汇时,译者要充分考虑翻译行为,评判和交际情景方面的文化差异,保证译文在预期内实现传达效果。翻译目的论强调译者主体性,译者依据不同目的,选择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来促成对外传播。

2.2.2 翻译传播学视角

异质文化间的传播体现着翻译作为传播手段的媒介性,借助翻译传播学研究红色文化外宣是当下重要课题和方向。奈达(Eugene Nida)(1969)指出语言交际产生于社会场合,把信息的发源者和信息接受者用串联的方式联系起来。国内涌现众多学者将翻译和传播学结合。吕俊作为最早将翻译和传播学理论结合的国内专家,提出传播涉及七个因素,并指明翻译活动也应从这七个因素着手研究^[17]。张生祥(2013)从学科关系视角探讨翻译和传播学的关系,认为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有益于深入认识翻译本质,注重翻译效果^[18]。谢柯和廖雪汝(2016)提出建立“翻译传播学”的初步构想,并论证了该构想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19]。也有学者认为翻译传播学的产生是人类交流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翻译传播发展的需要。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20]。覃丽赢、罗怡枫(2023)从翻译传播学的角度,以河北省西柏坡景区内红色文本翻译为例,探讨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和传播方法,进而展示国家形象,促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的海外传播^[21]。从翻译传播学视角探讨红色文化的外宣翻译,可以拓我们的研究视角,明确红色文化翻译目的,阐释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寻求达到最佳翻译的策略,有益于跨文化传播。

2.2.3 生态翻译学视角

功能主义关注目标语读者,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视角下考虑翻译研究,将读者纳入到翻译生态环境中,研究翻译过程中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翻译的生态整体性。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过程解读为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选择和适应。具体来说,翻译原则

可以分为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三个维度的转换。评判译文质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等因素,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22]。最早将生态翻译学用于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研究的学者是刘彦仕,他提出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的译者应该注意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3]。后续关于某一特点地区的红色旅游英译文本分析范式基本上未曾脱离以上框架。胡雁群(2013)研究湖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的翻译,得出公示语依赖于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转换时应各有侧重^[24]。同样基于三维转换的视角,还有一些研究者以韶山、西柏坡和辽宁红色旅游文本的英译为例,研究如何在不同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25,26,27]。

3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问题

总体而言,红色文化经典外宣翻译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文本层面上体现在拼写错误、语法错误、语义错误,术语误译、滥译。跨文化交流及意识形态传播层面上表述方式有待商榷,缺乏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对外传播收效甚微,海外红色文化传播与接受尚待更进一步研究等问题,研究当下存在的问题,对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具有深远意义。

3.1 翻译术语规范性

术语翻译的关键是要有规范意识和标准意识。规范性是术语翻译的基本准则,遣词用字要查之有据,特定翻译术语要标准化。术语的规范性和标准化要遵守相关机构已发布并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对翻译来说,这里的最高原则可能是“照翻无误”,体现着规范意识,执行规范化的高度自觉性^[28]。红色经典中术语翻译的规范性影响对红色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和理解。红色文化高频词和核心术语的误译、滥译造成受众对文本的接受和理解障碍,有些甚至是误解乃至歪曲,极大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造成误译的主要原因是术语规范意识弱,对源语术语的理解错误,同时也没有参照官方统一的英译名。其次,机器翻译因其效率高,成本低,可重复性强的优点成为新时代翻译届的宠儿,但在含有文化因子的红色经典外译中,机器翻译痕迹过于显著,忽略汉语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忽视对文化背景的考量

和语言习惯,从而造成理解上的歧义。最后,漏译现象较为严重,红色文化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性,体现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因自身原因造成缺词或大段漏译,不能全面充分的把握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这样势必影响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严重影响翻译质量和交际效果。

3.2 译文表达的准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9]翻译目的论的三条原则之一: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首先译文忠实传递原文具体内容和隐含思想,做到“忠实于原文”,不能肆意歪曲和随意增删原文内容。“忠实”还指照实转达原文风格不得肆意更改原作风格面貌,用自身风格替代原文风格。译文的准确性表达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最可靠准确的文化信息,夯实文化传递与交流基础。在红色文化翻译实践中,红色革命圣地的英文表述的准确性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以期增加在异质文化中翻译传播效果。革命纪念馆中红色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不足,近义词混淆,忽略近义词在确切的语义、情感色彩等深层含义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造成语义含糊,影响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红色文化正确理解,产生接受效果不佳等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标准翻译为“its final victory in both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但在实际译文中采用了“the wars”这样语义含糊的指代,造成为红色文化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3.3 翻译传播的接受度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30]外宣翻译效果传播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译文的接受度高,有利于对外传播。译文接受度低,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翻译家诺德^[31]将译出语受众的接受度纳入翻译传播的衡量范围,反哺翻译实践。

为增强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效果，要区分汉英差异，尤其是语言和思维逻辑上的差异，确保海外读者的接受度。英译中，逻辑关系通过连词、介词、顺序调整来体现，比较注重形合。汉语文本逻辑关系内隐其间，此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要将受众人群聚焦在国外，促成红色文化经典“走出去”。许多历史资料和翻译实践表明：要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通常要依赖母语译者的积极参与，将国内红色文化经典著作翻译成外文，为国外读者打开了新世界，也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不仅仅只是文化交流的一方面，更是让世界能看到中国力量。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由麦克法夸尔等三人主编的《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收录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的讲话、谈话和文件共19篇，全书正文523页，被列为“哈佛当代丛书”第6种。成为美国民众了解毛泽东红色思想的必备书。“孟加拉中国学会”主席纳茹尔·胡达·米尔扎根据孟加拉国读者的兴趣，选编并翻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在中国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促进了中国红色文化在孟加拉国的传播。由此可见，红色文化翻译急需我们积极主动承担翻译任务。增大国外宣传力度，为确保国外接受度高，也要增加本族语译者的参与，以提供高质量的翻译，增加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效果。

整体来说，红色经典文化外宣翻译上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有关红色文化经典的外宣翻译过于集中文本层面研究，忽略了影响红色文化传播的其他文化因素，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显得不足。其次，翻译实践和理论结合不够紧密，红色文化的翻译传播多是围绕生态学、传播学、目的论等视角展开，但现有的许多研究在深度上仍需加强，并且尚未充分体现理论结合的实践意义，未凸显其理论价值，未能积极探索针对不同研究目的和对象，要选择与之匹配的理论框架。最后，论证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不断完善。有研究者认为，在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上，受众接受程度不高，但缺乏相应的实证数据来支持。此外，还有专家指出，某些红色旅游景点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但未能提供相关论据支持。整体上论证方法上不够深入具体。

4 红色经典外宣翻译的对策与建议

为提高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效果，针对红色经典文化的外宣翻译上存在亟待改善的问题，拟提出相应改进建议，旨在提高红色文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质量，彰显红色革命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首先、加快红色文化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促进红色文化多语种术语库及知识库建设。术语翻译涉及多种学科互动，情况相对复杂。在讨论术语翻译时，应当依托术语学的相关理论，树立“术语意识”。在翻译实践中，对已标准化的术语与尚未标准化的术语，进行明确区分，区别对待。对前者要遵守颁布的标准，要有规范意识。对后者，可以参考具体的语境和惯例。同时灵活运用翻译方法和策略，做到“查、搬、译、注、连”，以实现型合和意合的统一。

其次，建立红色术语语料库。红色文化术语为国际受众解读红色革命历程提供了重要依据。术语库的建立能确保译文质量的专业性和语言的规范性，为红色文化术语翻译提供权威标准和规范，促进红色文化外宣传播。当前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共同主持，建设了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平台。此平台旨在服务于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及其翻译工作，基本涵盖了革命历史和红色故事中的常用术语，为红色外宣翻译术语标准提供重要标准和参考，同时，地方性术语库的建立也在持续推进中，以便更好地向国际受众呈现红色历史和文化。余莉，朱燕（2020）聚焦甘肃革命历史文化传播与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为语料源，选用SDL Multiterm Extract 2011作为术语提取工具，以国内权威翻译为主要参照，创建甘肃革命历史文化汉英术语库，以期在甘肃革命历史研究和外宣翻译中，为准确与规范的语言表达提供参考，进而有效讲述中国故事的甘肃篇章^[32]。国内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推动红色文化海外传播，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红色济译”团队专注于红色文化翻译和传播工作。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蕴藏着丰富的历史革命故事，如何正确阐述事实和立场，避免因翻译出现的纰漏，引起读者错误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加强对红色博物馆各类资源和语料库的开发与推广，创建多种语言的红色文化知识平台，有效传达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重点。

再次，建立专门的红色文化翻译管理机构和组织，着力培养和储备专业口笔译人才。翻译质量高低取决于译员水平。红色文化外宣的翻译与传播，需要依托大学或政府机构，成立专门的红色文化翻译团体，遵循特定红色文化翻译规范、统一相关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标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培养高水平的口笔译人才，才能实现对外译介的有效传播。在红色革命旅游圣地，配备专业多语言介绍团队，定期组织业务技能提升学习和培训，增强译者整体综合素质，适应国际游客的理解与沟通需求。与此同时，设立游客留言区，以便及时纠正发现的翻译问题。目前，外包翻译是在当下翻译市场中很普及，许多地区的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采用专业的外包翻译公司以提升对外宣传的效果，但由于外包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翻译成果的可靠性也显得不尽人意，进而影响外宣效果。当下，提升翻译质量应当成为重中之重，建议由相关宣传部门牵头，组建对外传播的管理机构，培养和储备专门人员，实现供需平衡关系，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传播。

最后，围绕红色故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体验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的革命促使各个领域经历深刻变革。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都设有官方网站，线上展览和介绍多采用多模态形式展开，通过这些网站，用户可以轻松访问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务必确保红色博物馆和纪念馆线上翻译的准确性是利于红色文化对外宣传，但是也缺乏交互性和体验性。许多革命圣地和纪念馆的形成基于具体历史事件和故事，现场参与和亲身体验互动带给人的感受更为深刻。因此，加强线下体验和参观成为传承和理解红色文化最根本的落地方式，线下在场的翻译质量高低成为我们获得对外宣传效果的关键所在。同时，开发双语或多语网站或移动客户端，利用新媒体手段，制作纪录片、短视频等，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传播红色故事。还可以利用VR技术，创设体验中心，增加中外受众的沉浸感和参与感，培养中国红色故事的海外讲述人和传播者。除此之外，很多纪念馆和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文创产品，升级各类凝聚革命事件、革命英雄或革命景观的红色文创产品，举办各类艺术创作活动，开发装饰性红色文化衍生产品，诸如书法、绘画或雕塑作品，通过物质属性的东西携带文化意义，实现对外

交流。此外，借助现代科技，设计以革命故事为主题的游戏软件，通过趣味性的方式传播红色文化，以更生动的形式展现这些历史故事。总之，红色文化的对外译介需要我们以多模态，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红色文化的译介传播。

“走出去”和“迎进来”相结合。组织国外媒体或专业人士参观革命圣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使革命文化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33]。”要深入挖掘党的伟大历程、革命奋斗的历程以及英烈事迹，强化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提高爱国情怀，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思想，确保革命精神和红色遗产代代相传，保卫这个不变的红色信仰。增强对外宣传的力度，通过多种方式传播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精神，借助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组织不同层次的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和媒体朋友参与，借助他们的力量将中国的红色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用他们的声音生动展现中国红色故事以及新中国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提升年轻一代对红色革命的理解，通过国内外高校与中学之间的合作，组织国际夏令营，注重提升国外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组织国际青少年红色文化之旅，前往井冈山、西柏坡、延安等地，亲身体验红色文化，促进国际上的共同认同。

积极组织多样化国内革命红色经典文化活动，推动红色旅游展馆巡回展和合作，汲取国外优秀的红色文化传播经验，强化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合作联动，促进各国翻译人才的交流和沟通，促进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同时，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交流和合作，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展览和交流活动，将中国红色故事融入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广阔背景中，搭建中国红色故事国际传播的平台，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红色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度。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手段，译者在做好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时，坚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

念,将文化自觉和自信融入到翻译实践中,深入研讨红色文化,以多模态形式促进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同时,译者还需充分认识目标语言受众的语言特征和思维模式,探索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方式,深入思考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文化融入全球的对话框架中,以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有效沟通。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的珍贵精神财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发展。传播好红色文化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平衡中国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鼓励多元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
- [2] Smedley, Agnes. *China's Red Army Marche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 [3] 王克非、王颖冲.论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6):87-93.
- [4] 倪秀华、焦琳.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J].外语研究,2023(01):57-62.
- [5] 倪秀华、李启辉.1949~1966年红色经典的翻译与海外传播[J].当代外语研究,2021(04):50-61.
- [6] 周晔.红色经典中有关“抗日”的英文表达与传播一由“抗日”一词翻译大讨论引发的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04):143-150.
- [7] 尚亚宁、王启龙.英文刊物《中国呼声》(1936—1937):译介、传播及其价值[J].外语教学,2022,43(05):70-76.
- [8] 石欣玉、黄立波.毛泽东著作英译与国家形象建构:基于语料库的考察[J].外语教学,2021,42(03):75-81.
- [9] 涂熙玲.红色旅游景点中的“红”字翻译[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4,15(2):130-131.
- [10] 周晔.红色经典中有关“抗日”的英文表达与传播一由“抗日”一词翻译大讨论引发的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4):143-150.
- [11] 邓晓宇、胡小婕、宋长健.基于类比语料库的红色旅游文本语言分析研究[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5,36(06):102-106.
- [1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09.
- [13]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10.
- [14] 卞建华、崔永禄.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与研究(1987—2005)[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29(05):82-86.
- [15] 赵艳、苏贝娇.从翻译目的论看红色文化旅游外宣翻译一以三明市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为例[J].昌吉学院学报,2018,(02):68-72.
- [16] 肖群.从翻译目的论看红色旅游景介的英译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49-150.
- [17] 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02):40-45.
- [18] 张生祥.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34(01):116-120.
- [19] 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J].上海翻译,2016(01):14-18.
- [20] 尹飞舟、余承法.翻译传播学论纲[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05):170-176.
- [21] 覃丽赢、罗怡枫.翻译传播学视阈下的红色旅游文本的英译研究--以西柏坡景区英译为例[J].新楚文化,2023(1):64-71.
- [22] 胡庚申.翻译选择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8.
- [23] 刘彦仕.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料的英译[J].外国语,2011,27(01):74-76.
- [24] 胡雁群.从生态翻译学看湖南红色旅游景点公示语翻译[J].科技信息,2013,(2):67-68.
- [25] 童婧.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双语标识译写研究一以韶山红色旅游景点的提示标识为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4,25(05):110-112.
- [26] 王霞、王云.河北省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生态翻译学阐释一以西柏坡旅游圣地外宣翻译为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5,9(01):66-72.
- [27] 王文彬.基于生态翻译学“多维转换”的红色旅游文本英译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33(2):57-59.
- [28] 郑述谱.术语翻译及其对策[J].外语学刊,2012(5):102-105.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

-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premier/2016-11/01/content_5127202.htm.2016-11-01.2021-05-09.
- [30] 中共中央政治局.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
- [31] Christiane N.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2] 余莉、朱燕.甘肃革命历史文化汉英术语库研究[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20,39(05):139-143
-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25.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